

北方文叢

吳玉章同志革命故事

何其芳著



新中國書局刊行



編主復而周

叢文方北

輯一第

事故命革志同章玉吳

著芳其何

行刊局書國中新

1949



吳玉章同志革命故事

最早的愛國思想

吳玉章同志的二哥吳永錕號紫光，前滑秀才，服膺宋人理學，是一個講究氣節的人。幼年，吳玉章同志和他共燈夜讀「通鑑輯覽」，讀到南宋衰亡史實，就聯想到當時中國的危局，好像亡國之痛就在眼前。他們把文天祥的正氣歌、訣命詞貼在牆上誦讀，他們尤其喜歡讀明末烈士黃淳耀所作的一節時文，「見義不為，無勇也。」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吳玉章同志說他永遠都記得：「一則放之須臾，而已與草木同腐矣；一則忍之須臾，而已與日月爭光矣。」這是說忠奸之分就在那臨危授命的一剎那間。吳玉章的二哥又把黃淳耀的事蹟寫在那文章的後面。滿清入關，城破國危時，黃淳耀先叫他的妻子、弟弟，上吊，然後說：「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來。」他也就從容自縊而死。吳玉章同志讀着他的文章，又很感動

於他的行動，自己也就想作一個節義之士。

甲午戰爭失敗的消息傳來了。讀着光緒求和的詔書，讀到這樣的幾句話：『將不知兵，士不用命，師徒撓敗，陵寢震驚』，吳玉章同志就不禁落下淚來。

這是吳玉章同志最早的愛國思想。包含在舊道德形式之下的民族思想。這是一八九五年。這時他十七歲。

戊戌新政的宣傳者

甲午戰爭後，列強瓜分中國之說很盛，而變法維新之說亦流行。吳玉章同志這時喜歡讀的書刊是時務報、萬國公報、蜀學報、經世文正續新各編、天演論和康梁的言論。戊戌政變時，吳玉章同志在四川榮縣鄉下得到那些變法的文件，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到處宣傳新政，勸人不要再作八股，人家覺得他們像瘋狂了一樣，稱他們爲『時務大家』。但因爲有皇帝的詔書爲根據，守舊的人只能在旁邊歎氣，說世道變了。一百天過去了，六君子被殺，新政被推翻，守舊的人這時就出來嘲笑他們了：『早說不對嘛，要殺頭哩！』他們就和這些人吵，說不怕，並用譚嗣同拒絕到使館避難，甘願作第一個變法的流血者的英勇故事來回答這些人的嘲

笑。

當時附近各縣的進步青年都團結在吳玉章同志的周圍。後來他們到日本去留學，許多都成了同盟會的會員。

君主立憲思想的改變

一九〇三年，吳玉章同志和他的二哥到日本去留學。這時，鄒容的『革命軍』一書出來了，打出了革命的旗幟。留日學生所出的『浙江潮』，『江蘇』等雜誌都有許多革命的文字。在這些之外，吳玉章同志又讀一些歐洲革命史和盧梭的『民約論』。於是他的思想爲之一變，覺得推翻滿清的革命主張是對的。不僅爲光復漢族的國家應該革命，而且爲爭天賦人權也應該革命，法國大革命殺路易十六正與孟子說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相合。

和吳玉章同志一道去日本的鄧孝可是一個崇拜梁啟超的人，在路上會約他到日本後同去見梁。吳玉章同志思想改變，到後却不願去，而鄧却真到橫濱拜梁爲師，成了梁的信徒。

當時的讀書人多看不起孫中山先生，說他沒有唸過書，不識字。滿清政府通緝他，把他

的『文』字旁邊加三點水，以表示海寇。這正如今天孫中山的叛徒們罵共產黨是『奸匪』，或者『插野鷄毛的賊寇』一樣。鄧孝可就是這一類讀書人，因此寧願崇拜梁啟超，而不能接受孫中山先生的主張。然而吳玉章同志和另外一些青年却是當時的最激進的革命派，一九〇五年孫中山先生到東京後，他們就和他一起組織了革命同盟會。

一九〇五年，當時留日學生反對『取締規則』運動失敗後，一個團結學生的羣衆組織『留學生會館』竟至無人過問。吳玉章同志却一人支持了九個多月，終於感動了他們，大家又熱心來恢復了組織。

一九〇七年以後，到處起義失敗，當時灰心失望以至變節求個人出路者很不少，以至東京學生中革命者竟寥寥可數，吳玉章同志却因此更加堅定振奮，把四川的同盟會員鼓舞起來，以團結各省的革命者。當時他主辦『四川雜誌』，章太炎主辦『民報』。『民報』經費困難，常至斷炊，章太炎曾寫信大罵孫中山先生，說他在華僑中捐了許多錢，却不拿出來維持同盟會的機關報。吳玉章同志竭力調和奔走，後來在四川會員中捐了許多錢去支持『民報』。一九〇八年，『四川雜誌』與『民報』同時被封，吳玉章同志被判半年徒刑。因為是學生，結果緩期執行。

對於暗殺的意見

由於革命形勢低落，暗殺的風氣起來了。從徐錫麟刺恩銘，秋瑾被殺後，許多暗殺行動爲當時的革命黨人所計劃着，實行着。當時守長江口的端方和守西江口的李準都是暗殺對象。

但吳玉章同志却是不贊成暗殺的。當汪精衛從南洋香港一帶忽然寫信給他，要他寄些製造炸彈的藥品去的時候，他回信說：『徵諸歷史，各國革命失敗時，則暗殺之風必盛。誠以志士仁人知大勢已去，唯有一死以報國。其志可嘉，其作亦可憫矣。今我革命非無希望，敵人正造謠說革命處處失敗，以圖渙散我革命之人心。兄爲我黨有名而能文之士，如果亦隨吾黨勇壯之士實行暗殺，即使有成，亦徒使敵人造謠，志士灰心，而黨亦受莫大損失。弟不贊成此舉，故不能寄藥品來。』

有趣味得很，汪精衛又寄來這樣一封信：

『來函愛弟深摯，令人感激。但弟以爲革命之事譬如煮飯：煮飯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爲德在一恆字，水不能蝕，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黨

人百折不撓，再接再厲。薪之爲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火焰萬丈，頗體質雖燬，借其餘熱可以熟飯，此正如我革命黨人一往獨前，捨生取義。二者之爲德孰輕孰重，頗難軒輊，要在各視其性之所近，擇一而行之耳。弟自顧素鮮恆德，故不願爲釜而願爲薪。兄如愛我，望卽賜寄各物。」

這一投機政客、漢奸的本質從他的早年已看出一點朕兆；而以後的翻雲覆雨，日趨下賤，的確可以「素鮮恆德」四字盡之。

吳玉章同志雖不贊成暗殺，但看到他當時似乎頗爲堅決，也就給他寄了些炸藥去。但他在香港謀炸李準不成，又到東京找吳玉章同志。吳玉章同志又爲他炸攝政王佈置一切，派喻雲紀，黃復生到北京開守真照像館，進行籌備，半年後，汪精衛去北京。不久暗殺尙未舉行，而黃復生，汪精衛實事失敗被捕。汪精衛以此爲世所知，實則此次暗殺組織者爲吳玉章同志，實行者喻雲紀、黃復生費力更多，汪僅一預擬之用電線放炸彈的人而已。

準備黃花崗起義

一九一〇年，吳玉章同志爲營救汪精衛、黃復生，祕密到了北京，與會醒之兄會季友共

同計劃劫獄等事。月餘，仍無頭緒。他寄寓在一親戚家裡。這位規戒見他行蹤可疑，並且知道他是革命黨人，害怕出事。有一天，先將車票買好，騙他上車，就一直送他到上海。他只得和熊克武、但懋辛、井勿幕到香港。這時黃興、胡漢民、喻雲紀、林時爽等正在香港一面實驗炸彈，一面商議廣州三月二十九起義。吳玉章同志參加了這次有名的起義的策劃後，就回日本去購運軍火。

吳玉章同志對這一任務完成得很好。每次軍火裝箱，他都去親手料理。後來運出了三四批以後，因為太忙，就叫另外一個人去替他裝。這個人把一百二十隻手槍裝在一個長不到三尺，厚不過幾寸的皮箱裡，看起來箱子不大，而提起來却重得幾乎要使人跌倒。這樣火車站上的人就懷疑了，故意將交通牌子弄錯。因為牌子錯了，運到橫濱後就要說明箱內東西是什麼，並打開來看，如果符合，才能領取。但這是一箱子軍火，如何打開看得？果然，運到橫濱後這隻箱子就被扣住了。吳玉章同志得到橫濱來的電報後異常着急。因為箱子上寫明了運香港，如果事情暴露，前幾批運出的還在海船上的幾箱軍火都是被沒收；而且報紙上一張揚，廣州起義計劃也將被破壞。他立刻坐火車到橫濱去。想了許多方法，花了整天整夜的時間，他終於把那隻箱子取出來了。最初，他買了一隻和它大小顏色都相同的箱子，裡面也裝一些

沉重的書籍鐘表之類；然後去找領事館的一個秘書寫信，想要求把箱子取出即存於領事館；如果能將箱子取出，則在途中偷偷把它掉換。但是，那個秘書正開始寫信時却碰到領事出來了，不讓寫。實在沒有辦法了，吳玉章同志就冒險自己跑到車站上去。這時其他行李都領取光了，就還只剩下那一隻箱子，一個日本人在看守着。這已是夜深人靜的時候。吳玉章同志就和他直接交涉，說箱子是朋友的，鑰匙早帶走了，實在沒有辦法打開，要他通融，和他交涉了許久，後來發現他的態度不是很嚴格，吳玉章同志就一邊和他說好話，一邊就大胆把那隻箱子提起，逕自走出來了。

當他回到東京時，宮崎寅藏一家人都高興得了不得。宮崎別號白浪滔天，是日本當時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中國革命黨人買軍火，都是由他介紹和日本軍火商秘密進行的。他怕還事暴露累及於他，一家人都正在惶恐中，把他們無政府主義者的一些秘密東西都放在他太太的背袋裡，揹在背上。所以吳玉章同志成功歸來，他一家人都驚異讚歎，說吳玉章同志胆大心細，有勇有謀。

第二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先生作了大總統，宮崎夫人到南京來，見到孫中山先山就總是要說：「你不要忘記了吳永珊。」吳永珊是吳玉章同志當時在日本用的名字。

並不是所有的同盟會會員都像吳玉章這樣勇敢，這樣忠實於革命的任務的。就是這次運軍火團國的頭一批，由一個姓鄒的會員在一隻美國海船上押運。船已經由橫濱出發了。黃興却從香港來了電報，說這隻船到時恐怕要被檢查不宜搭。吳玉章同志趕快派人坐火車追去通知這位姓鄒的會員，要他注意，並多給他幾百元以資應付，並囑咐他不要怕。這位先生結果怎樣辦呢，他就在船開行後把房艙的門關起來，把窗戶打開，取出箱子裡的軍火，一隻一隻地丟到海裡去。他到香港後，黃興和另外一些革命黨人都氣壞了，於是他就得到了一個綽號「鄒丟海」。

榮縣獨立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吳玉章同志又逃到日本。不久，四川的鐵路風潮起來了，同盟會就派他回四川工作。一九一一年六月，他到了宜昌，感到人民已很有不安於現狀的情緒，言談間對黃花崗起義的失敗表示惋惜。七月，他到重慶，見着謝持等，知道成都已成立了保路同志會，市民捧光緒牌位向總督趙爾豐請願，要他代請政府收回鐵路國有的成命，竟被他的衛隊開槍打死了許多人。他第二天即從重慶回到他的家鄉榮縣去。沿途見各城鎮都供着光緒的

牌位，兩邊寫着一付對聯：『鐵路准其民有，庶政歸諸輿論』。這是當時已經死去的光緒的上諭中的兩句話，用來表示鐵路國有是違反了光緒的意思。滿街都掛着黃布，彷彿像皇帝死了時一樣，行人都要下馬下轎才准過去。初看很覺滑稽，但這却是當時保路同志會的一種鬥爭方式。當時保路同志會有很多立憲黨人，如鄧孝可、張瀾、羅綸等。保路同志會是當時革命政治派別的大聯合，其中有同盟會，有立憲黨，有哥老會。一九〇八年，吳玉章同志因各地起義紛紛失敗，就感到要有廣大羣衆參加革命才能成功，就和湖北的孫武，湖南的焦大豐，廣東的熊越山，四川的唐潔、張玖祥和他的大哥吳匡時一起組織共進會，把各省的哥老會、孝友會、三合會等等聯合起來，照他們的山堂組織，仍以他們爲各地領袖，而他們又公推吳匡時爲坐堂大爺，吳玉章同志爲管事。所以當時的哥老會也是在同盟會影響之下的。

吳玉章同志到榮縣城門口時，正碰着同盟會的兩個會員龍鳴劍、王子湘率領數百武裝民團去救援成都。因爲當時保路同志會號召全省人民起來，集中成都與趙爾豐作武裝鬥爭。龍鳴劍見着吳玉章同志非常高興，他說：『你回來就有辦法了。我們帶隊伍到前線去，一切前途大計望你細心籌劃。』龍、王出發後，榮縣地主兼高利貸的當舖老闆郭慎之就打算約幾個豪紳控告龍於縣知事，誣告他劫奪公款。吳玉章同志知道了，馬上就召集了一個羣衆會議，

給他以嚴重的打擊，當場議決按租勸捐來幫助民軍，並加緊訓練各鄉民團來作後備。

龍鳴劍在仁壽縣秦皇寺與滿清巡防軍作戰失利，到嘉定病死。王子湘率領民團回榮縣，立刻請吳玉章同志商議舉事。榮縣縣知事和郭慎之聞風逃走，於是榮縣就宣佈獨立，成立革命政權。這是一九一一年舊曆七月中旬，比武昌起義還早一個月。

不久進攻威遠縣城，當天就攻下了。又進攻自流井，却遇滿清大隊巡防軍頑固抵抗，未能攻克。舊曆九月底，各地巡防軍集中自流井，又聽說端方大軍快逼近成都，人心就有些驚惶。而吳玉章同志却鎮定地說服他們堅守榮縣，並於舊曆十月一日與吳庶咸輕騎赴內江，發動又一起義。

內江起義

內江革命黨人很多。又有黃花崗起義犧牲了的喻雲紀烈士的家庭可以掩護。舊曆十月三日，吳玉章同志到內江，正碰到端方軍隊經過，得與軍中革命黨人見面，決定他們到資州後殺端方，吳玉章同志即於內江起義。五日，軍隊果在資州反正，端方被殺，內江知事也聞風逃去。六日晨，喻雲紀父親和當地革命黨人召集羣衆大會於天後宮露天戲台前，到數千人，

吳玉章同志在台上宣佈革命宗旨，主張建立革命政權，羣衆歡呼，聲震屋瓦。吳玉章同志說，這是他奔走革命以來最快活最榮幸的一件事，他當時感到恍如意大利馬志尼舞台上宣佈獨立一幕的重演。當時羣衆一致舉吳玉章同志爲政治部部长，吳庶咸爲軍事部部长，立刻入縣公署辦事。

在這以前三四天，成都新軍中有一個同盟會會員夏之時當排長，趁奉令出發討伐保路同志會的機會，於途中槍擊連長林畏生，率一連士兵二百餘人起義，直奔重慶。到後得城內張培爵、楊庶堪、謝持、朱叔癡等的響應，於十月二日已佔領重慶，成立蜀軍政府，張培爵、夏之時爲正副都督。十月八日，成都也成立了軍政府，蒲殿俊、朱慶瀾爲正副都督。於是四川全省遂告光復。

到重慶除害

吳玉章同志在內江一星期，把許多事情佈置妥當，即連夜趕到重慶。因爲當時重慶的革命黨人函電催他前去。到重慶那一天，就遇到林畏生持槍在都督府大鬧，說要和副都督夏之時拚命。好在夏不在，沒有出事。林在新軍中原是夏的連長，夏起義時怕林不從，曾槍擊過

他，只打傷了腿。當時林趕快就說：「我也是革命黨人。願意一同舉事。」攻下重慶後，夏爲副都督，給林以總司令名義。以成都尙未光復，重慶蜀軍政府派林與但懋辛各率一支隊進取成都。林認爲支隊長名義太小，故要找夏大鬧。林當時在重慶很跋扈，並且和匪徒勾結，常有不法行爲擾民，使重慶人心不安。吳玉章同志到後，正都督張培爵即問他怎麼辦。他嚴正地說：應該立刻嚴肅軍紀，執行革命紀律，開一個會議來討論這天發生的事情，並同時開軍事裁判會議執行軍紀。

張培爵同意這個意見。時已深夜，但仍立刻下令召集軍政全體人員開會，不許攜帶武器，並叫守衛妥爲戒備。

會開時，由夏之時報告事情發生經過，請全體討論解決。林畏生毫不在意，站起來大聲說：「我林畏生罪多得很！砍官防，其罪一也；撕委任狀，其罪二也；打都督，其罪三也；鬧軍政府，其罪四也。看你們敢把我林畏生怎麼樣！」他氣勢汹汹，說完就坐下。過了許久都沒有敢起來發言。

吳玉章同志看見這種情形，就從容站起來說：

「我們革命同盟會的宗旨是推翻滿清專制，實行民主政治，解除人民痛苦，並不是以暴

易暴，我們革命黨人是不侮鰥寡，不畏強暴的。扶正義，抱打不平，正是我們革命黨人的本色。如果我們今天剛一勝利，就橫行霸道，和滿清官吏一樣，實在違反革命初衷……。」

吳玉章同志慷慨沉痛地講了兩小時，最後主張執行革命的紀律，把這個會議變為軍事裁判。全場熱烈鼓掌，表示同意。這時林畏生驚異地看着他，心想哪來這樣一個陌生人，這樣會講話。

隨着夏之時說：『我本身就是當事人，不便主張裁判。我提議請新近由日本回來的中山先生的朋友，我們革命的老前輩，玉章同志作裁判長。』大家又表示贊成。

這是吳玉章同志沒有料到的。他想：我是主張厲行軍紀的，這豈不是殺人的事情要我来作嗎？他接着又想：如果推辭，旁人是一定不會幹的，事情又怎麼解決呢？他在自己心裡這樣考慮了一下，就說他願意接受，但有四個條件與大家相約：

『第一，我說明犯罪的行為時必須得衆人的同意；第二，我判決的處罰也必須得衆人的同意；第三，判決後罪人得申訴或聲明不服，並說明不服的理由；第四，判決後一定要遵照實行。如果大家都贊成這四個條件，我才能就職。』

大家都說：『這是最公平的裁判法，我們贊成。』

於是幾十個人組成裁判會就開始嚴肅地進行了。吳玉章同志詳細說明林畏生的犯罪行爲，違背革命宗旨，危害人民，無異企圖推翻革命軍政府，應照軍政府規定的軍法處以死刑。問大家同不同意，大家又贊成。於是又問林畏生是否服罪，限二分讓鐘他講話。林却沉默着。又延長五分鐘。他仍不講話。催他幾次，他才說：『說我想推翻軍政府，我沒有這個心思。』

吳玉章同志說：『我不能知道你有沒有這個心思，但犯罪是以行動爲標準，你的行動是危害軍政府的。』

他再也沒有話講了。於是吳玉章同志請夏之時執行判決。夏却猶疑不決地起來講了幾句話，說應該特設什麼什麼的。他的意思是說，裁判既是特設的，執行也應該特設。因爲他說得不清楚，有些人就以爲是「特赦」。他們就又反過來爲林畏生辯護，說林也是起義的人，應該特別從寬處理，赦免他。

吳玉章同志堅決反對，說他們違背剛才相約的條件，大家同意的却又自己來推翻。辯論了一小時，還是沒有結果。有一個激烈的革命黨人憤慨地說：『像你們這樣懦弱畏縮，我就拿炸彈來把大家炸死算了。』大家又紛紛反對他。吳玉章同志說：『不必性急；我試問林

畏生這樣蠻不講理的人，誰能保他不作亂事呢？」

這時有一姓蘇的團長起來說：「我保他，我們四團人保他。」

他話還沒有說完，衛隊中幾個士兵就一齊說：「就是這東西最壞！」因為四周人多，稍一驚動，就擠得刀槍摩擦作響，蘇團長以為士兵們要打他，急忙把頭低下去躲藏，一下子碰到桌角上，血流出來了。大家以為士兵們開了槍，都趕快逃避。於是會場上就剩下吳玉章同志、張培爵、夏之時和林畏生四個人。林也和他們一起勸士兵們安靜。衛兵說：「就是那蘇團長勸林司令做壞事。」吳玉章同志說：「現在暫把蘇團長扣下，另案辦理。今晚還是要把這個案子結束。」

於是又把大家請了回來。好在軍政府戒備很嚴，還沒有一個人逃出去。大家坐定後，吳玉章同志因為林畏生並未趁這次擾亂逃走或者有旁的不好表現，也就有從輕處罰他的意思了。於是就和大家商量，最後決定立刻解除他的職務，並且派人送他回湖北原籍。

這件事情充分表現出來了當時的革命軍政府的軟弱無力，也表現出來了當時的這些革命黨人的畏縮、妥協。然而，經過了吳玉章同志這一嚴正堅定的裁判，重慶的蜀軍政府總算得到了暫時的鞏固，更重要的是重慶的市民都高興為他們除去了一個禍害。

不願做官

民國元年正月，蜀軍政府派吳玉章同志和楊庶堪爲四川代表，到南京去。到時，臨時政府已成立。內務部次長居正和秘書長田桐一見到他就說：『可惜你來遲了，各部次長位置已經沒有了。內務部的司長參事隨你選擇一個。』吳玉章同志說：『我們革命不是爲做官；請你們不要提這個。』但接着他們還是送了疆理局（卽土地局）局長的任命狀來。吳玉章同志退了回去。他們又送參事的任命狀來，又還是退了回去。

後來孫中山先生在總統府祕書處幫助工作，他才接受了祕書處總務科的職務。這時已是正月底，正是南北和議將成的時候。很明顯地，和議一成，總統府祕書處就要取消的。因此開頭祕書處很多人來鑽營，而這時却大家都不願來祕書處做事。許多人都在另尋出路，甚至已有到袁世凱方面去找位置的人了。如程明超就是一個。他是一個舊官僚，原來在祕書處得了一個高位置，這時却不來辦事而急想離開，只有吳玉章同志却勤勤懇懇地支持這一殘局。

南北和議成後，四川的成渝兩個軍政府還是對立着。袁世凱托人向吳玉章同志說，要他

作宜慰使到四川去調停。吳玉章同志回答說：「我不作官；而且對故鄉父老怎麼可以用什麼宜慰使的名義？」後來袁世凱只有依照吳玉章同志的意思，不用任何官職名義，只是由政府派往四川慰問。吳玉章同志和朱芾煌一起回川。回來後，有人問他：「從都督和全城官員郊迎十里來看，你們好像是欽差大臣。但從你們輕車簡從，到處親切地和老百姓談話、講演來看，你們又像是傳道師。你們到底是什麼官？」吳玉章同志說：「我們不是官，是革命者。我們要勸老百姓剪辮子，不吃鴉片，不賭錢，不纏足，要讀書識字，要辦學校，要到外國留學。我們辦了一個留法儉學會，有志青年用很少的錢就可以到法國去留學。」

吳玉章同志這一次回川的結果，除了促成成渝合作外，並果然送了幾十個學生到法國去。後來留法儉學會發展為勤工儉學會，只要一百塊錢就可以到法國半工半讀。四川、湖南、廣東、河北、江浙及其他各省前後以勤工儉學到法國的有幾千人。這些人中，有後來成為有名的共產黨人的，如周恩來同志，王若飛同志，陳毅同志，聶榮臻同志，李富春同志和已經英勇犧牲了的趙世炎、陳延年等同志。

二次革命前後

辛亥革命後，同盟會就開始分化了。有的想實現歐美議會政治，有的主張無政府主義。章太炎高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擁護黎元洪來反對孫中山先生，汪精衛受了袁世凱的收買，強迫孫中山先生與袁議和。孫中山初不願和。汪精衛說：『你捨不得總統嗎？』孫中山先生就不好再堅持已見了。

孫中山先生素來都對吳玉章同志很好，認為他忠實而又識大體，有遠謀。民國二年四月，袁世凱暗殺了宋教仁，又不經國會同意就借了二萬萬五千萬外債，並用錢收買議員。同時，他要取消國民黨粵贛皖湘四省都督的消息也傳說得很厲害。吳玉章同志這時就向孫中山先生建議，主張四都督聯名通電反對袁世凱的違法，並聲明在合法內閣未成立以前不能受違法政府的命令，這樣來先發制人。孫中山先生贊成，而黃興却不同意。等到袁世凱免四都督職的命令發表後，遲延了許久李烈鈞才在湖口起義，以至師出無名，所謂二次革命不到三個月即完全失敗。

這年四月，國會開幕時，袁世凱花了許多金錢來收買議員，以至國民黨擁有大多數議員都不能選出一個議長。在選舉鬥爭的過程中，國民黨也用一些金錢來收買。吳玉章同志知道後非常反對。他向當時辦這類事情的國民黨人說：『我們的金錢沒有袁世凱多；與其用錢收

買而失敗，不如不用一錢以保持正義。如果我們初行民主制度即用金錢收買議員，民主政治就根本垮台了。」他們不聽吳玉章同志的話，結果花了二三十萬，議長仍是沒有爭到。

這些，都可以看到吳玉章同志很有遠見，而且堅持原則。

二次革命失敗後，吳玉章同志仍在上海各處奔走，進行反對袁世凱的活動。袁世凱的機關報上說重慶熊克武起義是他策動的，於是袁就下令通緝他。許多黨人都勸他出國，並爲他辦好手續，買好船票。吳玉章同志遂於一九一三年冬天去法國巴黎。

勸孫中山先生不要脫離羣衆

在日本留學時，吳玉章同志是學電氣工業的，而他天天從事的又都是政治。所以到巴黎後，他就改入巴黎法科大學，研究政治經濟。這幾年，他仍在國外進行反對袁世凱的活動。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凱死了。十月，他和蔡元培一起回國。

一九一八年，政學會楊永泰等與廣西軍閥莫榮新設計推倒孫中山先生爲大元帥的軍政府，而改爲七總裁的廣東軍政府。他們爲了假借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名義，雖擁岑春煊爲首，但仍不能不分一總裁的位置給孫中山先生。這個軍政府成立時，吳玉章同志適爲四川代表，

也在廣東參加政務會議。他們因爲吳玉章同志向來爲孫中山先生所信任，就要他到上海去勸孫中山先生就職。到上海時，孫中山先生正臥病床上，他敘述了這些事情的經過和真實情形，孫中山先生非常憤慨地說：『我不願與他們爲伍！』吳玉章同志勸他說：『我們作革命運動的人不能脫離羣衆，也不能脫離政治活動。現在他們不得已，勉強和你合作。如果你拒絕，他們還是可以假借護法的招牌欺騙羣衆。所以你還是和他們合作，以表示委曲求全，聯合反對北洋軍閥的苦心。不要看岑春煊今天煊赫一時，他不好好作去，不久就會垮台，恐怕他那時還要比先生今日的處境壞一百倍。』孫中山先生聽了很感動，以至流出了眼淚說：『我聽你的話，派精衛去作代表。』當時孫中山先生僅存的武力只有被排擠在漳州的陳炯明的隊伍。岑春煊、莫榮新他們還千方百計地想限制他，消滅他。吳玉章同志在軍政府的會議，總是和他們力爭，終於保存了這點實力，爲以後孫中山先生回廣東之用。

加入共產黨

偉大的十月革命對於中國起了劃時代的影響，在這以後，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從此開始。中國的無產階級從此走上了政治舞台。中國從此產生了真正能够

解放中國人民的共產黨。

一九一九年初，吳玉章同志讀到了一本日文的『過激派』（日本對布爾塞維克的譯名。）他非常高興。因為這本書解決了他三個多年不能解決的問題：

第一、他感到中國直接從事生產的只有鄉村裡的農民，一般知識分子和另外許多社會上的人都不願勞動，結果都市裡就有了很多游手好閒的人。如何能使這些人絕跡？他常常想，但想不出辦法來。而布爾塞維克却主張『不工作，不得食』，這就解決了他的問題。

第二、他又常常感到中國的官僚政治腐敗到了極點。民國以來，情形更壞，即使有一二好人也不能改變這種政治。這又怎麼辦？他常常想，也想不出辦法來。而布爾塞維克却主張必須粉碎舊的政治機構，代以新的政治機構，才能剷除一切污穢，這也又解決了他的問題。

第三、一九〇三年他在日本讀了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非常歡喜社會主義。辛亥革命後，他和李石曾等都歡喜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到法國後，又對於法國的合作主義也很有興趣，認為是到社會主義之路。於是他常和李石曾說：『我們應該成立一個强有力的組織來實行。』李石曾回答他：『無政府主義是不要組織的，只要從事教育方面多感化一些人就好了。』他總是懷疑這樣作到底有什麼成效。而布爾塞維克却要以革命職業家來組織堅

強的、戰鬥的無產階級的黨來消滅舊社會，建立新社會，這也就解決了他的到底實行社會主義要不要組織的疑問。

一九二三年，他就和楊闇公同志等二十餘人在四川秘密組織『中國青年共產黨』發行『赤光』評論，組織工會農會。當時因四川與外面隔絕，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一九二五年一月，他到北京，見到趙世炎同志，才知道已經有了中國共產黨。他就加入了。同時他寫信去四川，要楊闇公同志等把中國青年共產黨取消，個別參加中國共產黨。當時有的人還不能接受，主張合併也要有條件的合併，即是說這個組織不能完全解散，還可在黨內作爲小團體而存在。吳玉章同志堅決反對這種錯誤意見。結果有的就並沒有加入共產黨，而楊闇公同志等却加入了。

吳玉章同志的這種堅決是完全合乎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統一的最高的組織，絕不能容許黨內有任何形式的小團體存在。

創辦中法學校

國共合作後，國民黨於一九二四年改組，中國革命面目爲之一新。次年五卅慘案爆發，

掀起了全國反帝國主義的怒潮，成爲大革命的前奏曲，當時吳玉章同志在上海，原已定赴廣州，爲了參加這一運動，即緩期赴粵，並創辦宣傳刊物，爲了定名爲『反日戰線』，曾與戴季陶作思想鬥爭。因戴氏主張與日本妥協，連日以反英。吳玉章同志認爲暫時集中力量對英固可，但萬不能聯日，因爲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冤家對頭，決無妥協之可言。

是年吳玉章同志闖重慶辦國民黨四川省黨部。這就是大革命時候有名的蓮花池黨部。

吳玉章同志想，革命要有幹部。所以一到之後他就對原來在重慶辦省黨部的人說，應該辦一個學校來培養幹部。但是他們却笑他：『你以爲辦學校是容易的事情嗎，我們很久想辦都辦不成。』吳玉章同志不和他們爭論，却實際積極地去進行籌備。他原來是華法教育會的發起人之一，而這時華法教育會正計劃在北平、上海、漢口、廣州、重慶等地辦五個中法大學。這正好。於是吳玉章同志要辦的學校就有了名義：就叫中法學校。

然後日夜派人尋覓校址。在大溪溝找到了房子。

經費呢？從廣州回來時，國民黨中央會給他一千塊錢辦黨的費用。他就用上了這筆錢當然還不夠。他又把他私人在川江輪船公司的一千五百兩銀股票拿出來押當。這個股票利息很高，當了兩千多塊錢，他全部都用來作學校的經費了。

學生的來源也不愁。當時江北學生正鬧學潮，有些學生被開除。這個革命的學校就收容了他們。於是所有各地鬧風潮的學生都來了，一下就有兩百多人。

因爲是用革命思想來教育學生，學校空氣異常活躍。後來果然培養出了許多幹部。

人家很久想辦都辦不成的學校，吳玉章同志却一下就辦起來了。他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回到重慶，九日四日中法學校就開學。

籌備國民黨二次代表大會

通過從前在四川進行自治運動的幹部們，吳玉章同志很快把四川各重要市縣的國民黨黨部也成立起來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全省即選出了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一共六位，即吳玉章同志、黃復生、楊闇公、童庸生、廖划平等隨即動身去廣州。

他初以爲路程太遠，已去晚了。到後，才發現代表到的還很少。只有湖北到了董必武同志、向忠發、劉芬、錢介碧等五六位；海外到了彭澤民、許甦魂等二三十位。其他地方代表不但未到，甚至連選出都還沒有選出，連廣東的代表都尚未選出。吳玉章同志很覺奇怪，問是什麼緣故，大家說恐怕開不成會了。而當時國民黨西山會議派正要在上海開代表大會，要

把廣東的國民黨員開除黨。吳玉章同志很爲着急，就跑去找當時國民黨中央的負責人汪精衛，問他們是怎麼搞的。汪也說，恐怕開不成了。因會期延至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距這時已不到一個月了，吳玉章同志說：『開不成。你們就完了。』汪說沒有辦法。吳玉章同志說：『怎麼沒辦法！你們快些籌備就有辦法了。』於是即開國民黨中央會議討論。吳玉章同志被推爲大會祕書長，負責籌備。

吳玉章同志一作起籌備工作來就積極，迅速。緊張地辦公，打電報給各地，迅速選舉代表，並限期報到。這樣一來，到了一月一日，大會就如期舉行了。會堂門外造了一個一二丈大的地球。會議進行得熱烈得很。當時廣東有省港罷工工人及進步羣衆二三十萬人，常常遊行開會，晚上唱國際歌，幾里路遠都聽得見。而這個代表大會二百餘人中，也是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佔大多數。毛澤東同志當時也參加了這個會。被選爲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吳玉章同志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開了二十多天，通過了宣言，開除了西山會議派的重要分子。大會開幕幾天後，蔣介石從潮汕軍次歸來出席會議，有某代表提議向蔣起立致敬。但起立者寥寥無幾，頗爲尷尬。會後，代表們紛紛責罵這個人，使他在後來投票選舉中央委員時再不敢投蔣的票。這也可以看出當時大會中的民主精神。

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

大會結束後，吳玉章同志即回四川。當時大家本要留他在廣東，但他因四川國民黨組織剛辦起不久，仍要回去料理。到了宜昌，由於過於勞瘁，一下洋車後就暈倒了。有人拿一杯藥酒來給他吃了，才又活了轉來。到重慶，就入醫院養病。當時國民黨右派也在重慶成立了一個省黨部，天天找蓮花池黨部的人打架。在這時，他們就會唱雙包案。吳玉章同志在醫院裏，看見許多被打傷的人，問是什麼，他們怕他受刺激，不講。後來恢復健康後才知道是被反動派打傷了。

在廣州，反動派也猖獗起來了。三月二十日，發生了中山艦事件。因蔣介石不得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的同意，就自行逮捕大批人員，汪氣憤出國。五月十五日，蔣就召集了一個國民黨二中全會，要國民黨中央推一主席，結果就推了他自己。於是，他就把國民黨的政權，黨權都拿到他一人手裏去了。六月五日，又由他自己控制的政權特任他自己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於是，又拿到了全部軍權。

七月初，出師北伐，蔣赴前線，七月中，吳玉章同志經上海到廣州。廣州的國民黨人非

常憤慨這個獨裁者的專橫。何香凝一見着吳玉章同志，就哭起來了。她說情形這樣糟，怎麼辦？這樣下去，一人專橫，國民黨就垮了。吳玉章同志就聯合其他國民黨人於八月底召開執監聯席會議，通過了一些重要議案。如恢復國民黨內民主制，反對個人獨裁，保護工農運動，規定二五減租等。

當時北伐軍隊，蔣介石率領的一路向南昌進攻，軍械雖好進展却很慢。而第四軍是進攻長沙的一路，軍中葉挺爲教導團團長，全軍共產黨員很多，政治工作好，人民發動起來，所向無敵，號稱鐵軍。九月間已攻下漢口漢陽，十月十日下武昌。當時國民黨中央決議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遷移武漢，於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到達辦公。十一月初國民黨中委與國民政府委員，已有一部份到了武漢，因黨政軍有許多緊急事務須要處理，乃成立聯席會議，吳玉章同志以國民黨中委資格參加。武漢羣衆運動蓬勃展開，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英水兵擊傷人力車夫，數十萬羣衆示威，政府依靠羣衆力量，強硬交涉，收圍漢口英租界，震動了全世界，武漢政府成了革命的中心。

蔣介石遲遲攻下南昌後，感到武漢革命羣衆力量雄厚，如在廣州時一樣可怕，不願來武漢。他要政府遷南昌，大家不贊成。漢口租界收圍後，世界輿論都承認武漢政府是革命的

中心，外國報紙上那時也說這是八十年來中國不會有的勝利外交。於是遷都南昌的想法就更不可能了，他也只有到武漢看一看情形。他到時，羣衆數十萬人開會歡迎。他講話時，會中就有人問他爲什麼不搬到武漢來，什麼時候搬來。他感到了武漢革命羣衆的力量可畏，回南昌後就更不願來了。

這時南昌與武漢之爭很僵持，蔣介石在南昌召集一秘密軍事會議，企圖以武力威脅武漢政府，武漢政府（聯席會議）乃召集一個黨政軍擴大會議，通過提高黨權，實行民主，反對獨裁，定於三月七日召集國民黨三中全会，解決一切問題等決議，並推舉五人成立一行動委員會，執行這一決議。吳玉章同志、鄧演達、徐謙、孫科、顧孟餘當選爲委員。

三月七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会在漢口開會，蔣介石氏拒不出席。但這次會議還是勝利的完成了：廢除國民黨主席制爲九個常務委員的會議制，以軍事委員會代替總攬軍政的總司令制、改組國民政府等等。

三月二十一日上海第三次起義勝利。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第一、六軍佔領南京，這時長江上下游都打通了，革命聲勢極盛。

這一段與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歷史，一方面顯出了吳玉章同志的英勇堅決，另一方面

也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有趣味的事實：原來今天拚命強調革命人民要服從他的軍令政令的人，他自己却是既不服從軍令，又不服從政令，甚至於不服從他的黨令，而且是以此起家的。

大革命失敗

武漢政府成立以來，革命形勢空前高漲，工農運動尤爲突飛猛進。有組織的工人超過了三百萬，農民協會的會員有一千多萬，湖南農民運動最爲發達，鄉村建立了農民自己的政權，盜匪乞丐絕跡，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但正當革命着着勝利的時候，帝國主義的高壓政策與分化政策就拿出來了。

首先是革命軍攻下南京時，帝國主義的軍艦就砲擊南京以威脅革命。其次又利用南昌與武漢之爭，勾結革命內部半途叛變的分子，從內部來分化革命力量。反動派頭子得到攻下南京的消息，即於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從南昌到上海，沿途在九江安慶嗾使流氓搗毀左派國民黨的黨部，並派人到重慶組織三·三一大屠殺。四月十二日，他又在上海舉行政變，封閉工會，屠殺大批工人和共產黨員，並在南京成立反革命的政府與武漢政府對立。

四月初，投機政客汪精衛從蘇聯回上海，即偷偷與蔣介石、吳稚暉會面。吳大罵汪，汪

卽哭訴說：『我也是反共，不過方法不同而已。』從這以後，汪精衛回武漢，就實際是一個革命陣營內的好細了。

武漢政府以前之有力量，主要在於當時的革命領導者很堅決，不動搖。但等到四月初，陳獨秀在上海與汪精衛發表汪陳宣言，並一同來武漢後，這個可恥的投降主義者却一切都順從這個好細。汪說農民運動過火了，陳也就召集幹部發佈下令，說農民運動過火。五月二十一日，長沙許克祥舉行政變，屠殺了許多工農。五月三十一日，湖南數萬農民憤而進攻長沙。汪說不許農民進攻，陳也就趕快命令不許農民進攻。第四軍本來是不願分共的，汪天天去煽動，有些將領也就動搖了。

七月十四日，汪精衛等舉行秘密會議，通過了分共的議決案，但仍標榜要打倒蔣。胡漢民寫信給他說：『反共猶須反蔣，則聯共尙須倒汪，天下滑稽之事寧有過於此耶？』這倒是一語道破了這一批孫中山先生的叛徒的真心思。

在這秘密反共會議上，孫夫人沒有出席，但派陳友仁代表她講話，很沉痛地指出與共黨合作是中山先生親自所訂的政策，並且合作以來革命有了很大發展，因此反對分共。她的意見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而汪精衛就是反對這種意見的領導人。吳玉章同志聽見了這樣的消

息，才知道汪已經是一個奸細。至今他還深悔他當時的革命警惕性不夠。

這天晚上有一點鐘，吳玉章同志得到了這個會議的消息，馬上回寓，很久不能入睡，兩三點鐘還在晒台上歇涼。後來見有一個人帶了四個兵士來到了大門口。四五分鐘後，他們由後樓入內，取下電話，並留一信。信上說外面風聲很緊，勸吳玉章同志避開，未署名。吳玉章同志與同住的鄧懋修商量，移住另一地方。

次日清早，吳玉章同志本想即往武昌暫避。後又想，他一人管國民黨中央黨部，賬目未交，恐反動派藉此造謠誣蔑。於是九時到中央黨部，留信告汪精衛說，似此情形，不能再留在這裏，並把印信賬目都交代清楚。

八月一日葉挺賀龍在南昌起義，吳玉章同志、朱德同志、周恩來同志、林伯渠同志、劉伯承同志等都參加了。吳玉章同志任革命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隨軍轉戰江西、廣東、福建。十月在潮汕湯坑一戰挫敗，在流沙開會，決定將幹部分派各地。吳玉章同志、林伯渠、劉伯承等同志由港轉滬，遂赴蘇聯。

在蘇聯

在莫斯科中國勞動共產主義大學特別班學習時，吳玉章同志雖年已五十一歲，仍是一個很用功的學生。經濟學教授說全班算吳玉章同志和錢亦石兩個對於資本論有深刻的了解。對辯證唯物論，列寧主義，也很用功學習。馬克思說：『理論只要一掌握羣衆，就立刻成爲物質的力量。』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吳玉章同志讀着這些話，深深感到了學習理論的重要。他堅信辯證唯物論的真理。他常常服膺的是：用辯證法來觀察事物，不但要注意事物的互相聯繫和互相制約，而且要注意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因此，依辯證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那在目前似乎堅固、有力、但實際已開始腐化死亡的東西，而是那正在生長着和正在發展着的東西，即使它在目前還似乎很幼稚，不是很強大的，但却是不可被戰勝的。從這，吳玉章同志就斷定，過時的腐朽的封建主義和垂死的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必然要死亡，嶄新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必然要勝利，而到了適當的時候，社會主義社會也必然要到來。吳玉章同志又用辯證法去研究中國古代的哲學書籍如易經等，他發現它們當中含有一些辯證法的因素。在特別班中，吳玉章同志的學習成績最好。

一九三〇年畢業後，吳玉章同志到海參威作遠東工人列寧主義學校教員。一九三一年，以瞿秋白同志在蘇聯時所擬的草案爲基礎，吳玉章同志和蘇聯一些研究文字學的學者製訂了

中國字拉丁化方案。

吳玉章同志在海參威作拉丁化運動講演，一個叫漢斯基的教授起來反對，說東方文字很好，中國字尤其好。這和當時盛京時報上胡適說中國文字是神聖文字的論調相同。但吳玉章同志把他駁倒，仍堅持實驗推行，結果證明當時中國工人學起來很快，幾個月就會運用新文字。他們一方面為實驗，推行而努力，但同時也並不是簡單地認為漢字很快就可以廢棄。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海參威中國工人召集的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則和規則』中，就有這樣一條：『大會認為語言文字是隨着社會的經濟政治的發展而發展。它當然要有人力的推動，但它也有必經的過程和步驟。因此實行新文字並不是立刻廢除漢字，而是逐漸把新文字推行到大衆生活中去，到了適當的時候，才能取消漢字。』因此，在這個改革文字的問題上，我們一方面要反對保守的右的觀點，一方面也要防止那脫離實際脫離羣衆的『左』的觀點。

一九三五年，日寇日益橫暴，全國民衆抗日情緒高漲，我黨發佈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團結抗日。吳玉章同志到巴黎辦『救國時報』，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九三六年，岡莫斯科作東方大學中國部教員，想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整理中國歷史，並依照史大林提倡的寫歷

史的方法，用編年敘述歷史人物與事實，從前章太炎痛心印度無歷史，研究印度文化很感困難，而推崇孔子作春秋創編年紀事法。吳玉章同志亦認爲應有確實的時間、地點、人名、事實，然後才能成爲真正表示人類發展過程的歷史，而不是傳說，或零星故事。

關於新文字與歷史，吳玉章同志有『中國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中國新文字的新文法』；『中國史教程』，『研究歷史的意義』等著作。

這說明吳玉章同志不僅是一個英勇堅決的革命實行家，並且是一個對革命理論與中國學術都有研究的人。

和托派鬥爭

今天中國的托派已經墮落到不能公開他們的面目了，但是他們仍然在用他們的賣身錢辦這樣雜誌，辦那樣雜誌，說中國共產黨進行的土地改革不夠『澈底』呵！說聯合政府就是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呵。之類，彷彿他們是最『澈底』的一樣。但是，在一切進步的刊物以至自由主義者的刊物都被反動派查禁時，這些托派雜誌却都是印得有『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號』，通行無阻，則也就一下子洩露出他他的『身份』了。無論用什麼說法，都

是與那些國民黨的公開特務報一樣，盡其反共任務而已。

就是當托洛斯基派還未墮落到這樣時，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意見實際也就是有利於中國反革命派的。像陳獨秀，原來主張中國的民主革命讓中國的資產階級去領導，因此一切投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而後來却又成爲托洛斯基的信徒，相信中國已無封建勢力，應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就不應與中國的資產階級合作。這豈不是奇怪已極嗎？正是因爲這樣奇怪已極的『理論』永遠無法行得通，他們才只有投入法西斯集團的懷抱裏。

吳玉章同志到蘇聯時，正碰到當時托派的活動。他們散發他們的宣傳品到學生中。有一個中國印刷工人，被托派拉入他們的小組織裏去了。黨要清查他時，他來找吳玉章同志，說他是遭別人攻擊，他不過看過旁人給他的托派傳單而已。吳章同志並不知道他的實際情形，但却很有原則地勸他對黨誠懇忠實，無論什麼都講出來。因爲在當時，假若全部坦白講了，本來就沒有什麼。但這個人却騙吳玉章同志，說他沒有什麼隱瞞。過了兩天，人家却證明他還有未坦白說出的事實。他這時再來找吳玉章同志，吳玉章同志就不理他了。結果他被開除出黨。

在海參威教書時，遠東出版局要吳玉章同志編一本中文教科書。他當時因事忙，就摘錄

了一些史大林的講演和沈澤民同志在莫斯科編的一本中文教本內的幾篇文章，再加上幾篇他自己作的文章，編成一本書。當時托派分子在遠東相當多，和吳玉章同志他們鬥爭得很激烈。書一出版，他們就在遠東邊疆黨部告了吳玉章同志說他犯了許多機會主義的錯誤。吳玉章同志聽說後，大為驚訝，馬上把他們所指摘之處細細檢查。果然在他自己作的文章裏發見了一個錯誤，就是只簡單地說蘇聯消滅富農，而沒有說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來消滅富農，而沈澤民同志所選的幾篇文章，其中關於中國革命問題，國家問題，道德問題等，也有一些錯誤，因為吳玉章同志認為沈澤民同志是理論修養很好的，他選的文章不會有錯誤，故編時未細心考究它們的內容。於是吳玉章同志就化了半個月的工夫，把馬克思，列寧，史大林關於這些問題的理論加緊研究。當他深刻地了解了這些問題後，他給黨的支部寫了一篇很長的聲明書，其中把這些錯誤都寫了出來，就是托派沒有看出而他自己認為錯誤的地方也寫出來，並對於錯誤的來源加以檢討，說明他對於自己作的或選別人的文章上的錯誤都願完全負責，並誓與這些錯誤觀點作鬥爭，以保持布爾什維克黨的理論的純潔，最後請求黨給他以嚴重的處罰，以作黨員不加深學習和作事輕率疏忽的教訓。

接着黨就開支部會議來討論這問題。吳玉章同志又誠懇地將聲明書中的內容口頭報告一

遍。許多同志都說他對黨忠實，坦白承認錯誤，並且認識錯誤深刻，改正錯誤也誠懇堅決，處罰應從輕。有的說應給以輕微的警告，有的說給以勸告就够了。最後林伯渠同志却說：「我認爲不必給以處罰。黨之所以給黨員以一種處罰，是希望他成爲一個好黨員。現在玉章同志自動地就作到了這點。所以我認爲不必給以處罰，只須作一決議，指出他的錯誤，嘉許他承認錯誤，認識錯誤，並願和錯誤作鬥爭，這是黨員應有的態度，最後還希望他加深理論研究來完成他願和正確理論作鬥爭的任務，就够了。」

大家一致贊成這個提議，真就照着林伯渠同志的意見作了一個決議。在這以後，黨員羣衆和負責同志不但不因吳玉章同志犯過錯誤而輕視他，反而對他更加信任、尊敬，認爲他對黨的忠誠可作黨員模範。

所以這一次，托派並未能打擊吳玉章同志，反而因此更顯出來了吳玉章同志的優美的布爾什維克的品質。

這種對黨的坦白忠誠，對自我批評的嚴肅認真，是每一個共黨黨員都應該向吳玉章同志學習的。

抗戰後作國際宣傳工作

七七抗戰爆發，吳玉章同志由莫斯科被派到巴黎作國際宣傳工作。十一月十四日到巴黎，李石曾一見面就相約到北京不魯爾塞。因為這時簽字於九國公約的各國正在不魯爾開國際會議，討論日本侵略中國問題。吳玉章同志會見出席該會的中國駐歐各使節，力主在會議上要各國制裁日本，援助中國抗戰。當時中國代表團中頗多吳玉章同志舊日熟人，如胡世澤錢泰就是他從前在巴黎的同學。當晚，胡世澤約他到房裡去談，說消息不好，國內要和日本議和的說法很厲害。這時正是德國大使陶德曼在南京提出和平條件，中國政府有妥協趨勢。吳玉章同志還不相信，說中國無論如何要抗戰到底。胡世澤以舊日同學的關係，更說出了確實消息。他說恐怕不能挽回了，以前主戰的人現在也主和了。吳玉章同志再三問他是誰，他說是孔祥熙。吳玉章聽說後，馬上對代表團顧維鈞等說抗戰剛才團結了全國力量，振奮了全國人心，提高了國際地位，如果此時言和，中國將不能免於滅亡。要他們聯名打電報回南京，無論如何不能和。又要李石曾也打電報給蔣，希望他抗戰到底。後來得到蔣發表不願和的消息，吳玉章同志才放心了。中國代表團在國際會議上說話也才有力了。

到巴黎後，吳玉章同志和顧維鈞大使商談國際宣傳工作，他說這事由楊光法負責，要吳玉章同志和他接洽。但吳玉章同志和楊談了好幾回，總覺彼此意見不合。楊的辦法是向法國上層人士和官廳作宣傳。他化十多萬法郎印了一本宣傳冊子，上面印了北平天壇前門之類的古蹟和一些中國負責人物的像片，並未把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事實、和團結一致的精神表現出來。印好後，他又要巴黎時報附送給它的訂戶，而這些訂戶也多是法國上層人物，他們根本對中國抗日無興趣。因此他的宣傳沒有什麼效果。吳玉章同志不然，他是向法國同情中國抗日的廣大人民作宣傳，尤其是工人羣衆。因此後來有日本買軍火的人到法國飛機廠參觀，廠裏工人就罷工來抗議，使這些日本人狼狽而去，還有英法輪船碼頭工人也不肯爲日人運軍火。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國反戰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會長郎之萬特爲吳玉章同志召集了一次新聞記者招待會，由吳玉章同志報告中國抗戰情形和中國能够勝利的條件（全文見「吳玉章抗戰言論選集」）到會記者四五十人，大家很熱烈地表示贊同，並願意援助中國抗戰。但很可怪的，有幾個國民黨的壞分子却反而故意提出許多怪問題，說上海南京都已失守，中國沒有海軍，武器不够，等等，怎麼辦。他們的意思是想反駁吳玉章同志，說抗戰沒有勝

利的可能。吳玉章同志却有力地回答了他們，說戰爭主要的不是靠武器而是靠人民。這些替日寇宣傳的壞分子也就啞口無言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吳玉章同志出席倫敦世界反侵略大會。他會與陶行知先生一同去瞻拜馬克思墓。在一個很大的公共墳場中找了許久，後來從墓碑上恩格斯題的幾句話才找到了，它原來和普通墳墓沒有什麼不同，一樣樸素地就在這廣漠的墳場上。對着這個巨人的墳墓，吳玉章同志很慨歎地想起了中國某些人却要修一座皇陵一樣的陵來埋葬孫中山先生，這也許並非一個人民的革命家所希望的吧。

三月，吳玉章同志動身回國。四月初到西貢，沿途很多華僑來請吳玉章同志講演。因為他辦的「救國時報」在華僑中有很大影響，所以這些地方的華僑對抗日戰爭非常熱烈。四月底到武漢，即參加了當時我黨的國內統一戰線工作，並作了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由重慶回延安。

整風運動

一九四二年四月，延安整風運動開始。

吳玉章同志對於整風運動一開始就很熱心。他說，他最初自家以為還學了一些馬列主義，書本上的了解還不錯，但越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報告才越感到自家並未搞好。他細細地讀，感到有些話就像批評自己一樣，如毛主席批評教條主義那些地方，他就有些感到毛骨悚然。他說，起初也有點不痛快，後來細細一想，不痛快正是自己有這個毛病，刺到了痛處，既然發現了自己的毛病，何必護短呢？就用毛主席指出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法來醫治自己，豈不很好嗎？這樣一想，就沒有什麼不痛快，反而高興起來了。於是他就認真來檢討，批評自己。他和中共中央的同志們開會來互相檢討，自己批評，請別人批評。起初聽到別人的批評也有些難過，後來想通了，就喜歡人家批評了。他覺得在整風以後，才深入地了解了馬列主義，了解了辯證法。了解了馬列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必須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革命的實踐相結合，而不是機械的選用馬列主義書本上的條文。才是真正地懂得了馬列主義。毛主席確立了這個改造思想的方法，使每個黨員都能有正確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因此我黨才有今天這樣偉大的力量。

他說中央同志們的互相批評，自我批評，都是很熱烈的。有一位過去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因為錯誤很沉重，經過了幾個月的苦痛，終於還是想通了。在七大開會時，他報告他過

去犯的錯誤，講得痛哭流涕，大家也都很感動。由於他的認識錯誤與改正錯誤，大會仍然選他為中央委員。整風以後黨內的思想統一了，同志間十分和諧，生氣勃勃，所以七大開得很好，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後記

以上故事共二十則，爲慶祝吳玉章同志六十八歲大壽而整理。由於所知有限，又係匆促寫出，遂難免簡陋潦草。補充潤色，使之較爲可讀，則尙有待於他日。執筆既竟，已至鷄鳴不已之時。新中國之光明亦已迫近。聞風興起者其與日俱增乎。爲贅數語，以誌感奮。

一月四日晨三時半



HK\$0.80

20